

伯希和與巴黎中國學院*

Pelliot and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Paris

葛夫平 (Ge Fuping) **

在國際漢學界，伯希和是一位舉世公認的泰斗，他不但被譽為法國第一流漢學家，而且被尊奉為那個時代裡所有西方中國學專家的「祖師爺」。¹有關這位漢學大師的學術貢獻及傳奇式的人生經歷，學界已是耳熟能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關這位漢學大師與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前身——巴黎中國學院的關係，以及他如何通過該機構推動法國漢學的發展，迄今鮮為人知。在這位漢學大師誕辰 130 周年行將到來之際，特將這一段塵封的歷史公諸於世，以誌紀念。

一、從局外人到進入董事會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的前身巴黎中國學院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最初係由中法兩國政界人士倡議創辦。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中西方國家開始反思人類文明，開始將眼光再次轉向中國所代表的東方文明。受此世界文化思潮的影響，當時法國一些政治家也感同身受，法國總統即聲言：「欲圖

戰後文明之進步，必先使世界上最古光彩燦爛之中國文化與法國文化兩者智的關係深厚固結。」²1921 年巴黎中國學院成立後，法國前總統費李爾和德薩乃爾也在致徐世昌總統的電文中分別聲稱：「文明進步，賴大邦民族之提攜，順運會遷移，而發展尤在實質相助，教化互通，根本既深，枝葉益茂；中國文化自昔為世界所推崇，若使中法兩國之英賢更增觀摩之善，其於世道人心必多進步」。³而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因不滿國內的新文化運動，也有意弘揚和提倡中國傳統文化，並將一戰看作傳播中國文化於西方的天賜良機。徐世昌總統在一戰結束後就專門寫了一篇有關東西方文明的文章，宣稱：「世界文明不外兩大宗派：一曰西方文明，一曰東方文明。二者互有長短，調和之，熔冶之，實為戰後之最大急務，亦惟戰後最好時機。」他呼籲中國作為東方文明的代表，趁此西方國家反思西方文明之際，積極承擔起傳播東方文明的責任，指出「克勝此絕大最高任務者誰乎？吾以為除吾國外，實無可他求者也。」⁴而最早建議設立巴黎中國學院的北洋政府前交通總長葉恭綽⁵在寫給班樂

* 本文的寫作，得益於法蘭西學院教授、漢學研究所所長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先生的邀請，並向筆者開放漢學研究所檔案以及提供他本人所做的關於巴黎中國學院創辦和該院在華採購圖書資料的筆記，還對本文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楊漢章譯，《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頁 241。

2 羅增益譯，〈日本人之中法文化運動觀〉，《旅歐週刊》81 (1921.5.28)。

3 林開明、陳瑞芳、陳克、王會娟編，《北洋軍閥史料·徐世昌卷》9(1919-1922)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頁 651、653。

4 徐世昌，《歐戰後之中國》(1921 年印行)，頁 56-57。

5 葉恭綽 (1880-1965)，廣東番禺 (今廣州) 人，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畢業，曾任京漢鐵路督辦。民國成立後，先後出任交通部次長、總長兼交通銀行經理。1915 年贊助袁世凱稱帝，任大典籌備處委員。洪憲帝制失敗後，被免職。1917 年張勳復辟，在馬廠辦理軍事運輸事務，任段祺瑞討逆軍總司令部交通處長。1920-1922 年連任靳運鵬、梁士詒、顏惠慶內閣的交通總長，為交通系主要成員。1922 年 5 月任廣東政府財政部長。1924 年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交通總長。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國學館館長等職。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

衛（Paul Painlevé）的信中，則直言他們熱心向國外宣揚中國文明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和糾正當時中國國內新文化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明顯的過激傾向。⁶在此歷史大背景之下，同時為促進中法兩國政治特別是經濟關係，1919年葉恭綽代表北洋政府赴歐考察期間，向法方有關人士建議在巴黎設一中國學院，開設中國學術講座，並允諾為巴黎中國學院提供一套《四庫全書》副本，供法國學者研究，以推廣中國文化。⁷葉的這一倡議得到法蘭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前總理班樂衛的熱烈回應。班氏於7月18、25日和8月1日先後三次在法蘭西研究院召集有關人士開會，討論在巴黎設立中國四庫全書圖書館（une bibliothèque des quatre grands classiques chinois）和開設中國學術講座問題，並組織成立巴黎中國學院發起委員會（le Comité d'initiative pour la création à Paris d'un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⁸

此時，伯希和剛剛結束他在法國駐華使館武官的生涯，回國繼續他在法蘭西學院的中亞語言、歷史與考古

講座。⁹因班樂衛的邀請，伯氏參與了巴黎中國學院的籌備工作，出席了7月25日和8月1日的二次籌備會。作為一名專業漢學家，伯氏獨具慧眼，對由中方向巴黎中國學院贈送一套《四庫全書》的方案表現出特別的興趣，認為這件事對《四庫全書》的保存和法國漢學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極力促成此事早日落實。¹⁰根據伯希和的建議和要求，1920年葉恭綽回到國內後就向北洋政府提交了一份「闡揚文化條陳」，其中即建議著手影印《四庫全書》，以收保存和流布之效。¹¹

然而，就在1920年初巴黎中國學院行將正式成立之際，伯希和因與巴黎中國學院中方代表韓汝甲關係不和，退出巴黎中國學院的籌備工作。韓汝甲反對伯希和進入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Comité d'administration），認為他的加入「會引起某些中國人政治上的反對」。¹²韓本人也拒絕與伯希和討論巴黎中國學院問題。¹³在遭遇如此非禮的冷遇之後，高傲的伯希和憤然退出籌備工作。此後，伯氏又拒絕參加巴黎中國學院中國文明課程

6 遐庵彙稿年譜印行會編，《葉遐庵先生年譜》（1946），頁76。

7 同註6，頁74。

8 “Circulaire de Paul Painlevé, le 22 juillet 1919,”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以下簡稱Archives de l'HEC）。

9 1918年漢學大師沙畹（Edouard Chavannes）謝世後，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席出現空缺，當時法蘭西學院院長（Administrateur du Collège de France）克魯瓦澤（Maurice Croiset）讓法國外交部轉告時在北京擔任法國使館武官的伯希和，詢問他是否願意將他原來的講座與沙畹主持的講座合併，開設一個名為「中國和中亞（西域）語言、文學、歷史的講座」。伯表示，為保持法國漢學的優先地位，最好不要合併，而是單獨保留，由他與馬伯樂（Maspero）或者胡盧梭（Hurousseau）共同主持漢學講座。從後來的情況看，法蘭西學院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建議，繼續保留獨立的漢學講座，但由馬伯樂單獨主持。“Télégramm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kin, Paris, le 21 mars 1918,” et Télégramme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kin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ékin, le 26 mars 1918,”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Asie 1918-1940, Chine*, V. 47, PP. 1-2.

10 “Note sur le SSEU-K'OU-TS'U'UAN-CHOU,” *Archives de l'HEC* ; “Pelliot, Les Cinq Millions de Pages Manuscrites du “Sseu-K'ou-Ts'üan-Chou,” *Communique No.2*, 25 Septembre 1923,” *Archives de l'HEC*.

11 《遐庵彙稿》上編，頁88；葉恭綽，〈刊行四庫全書提案〉（民國十年），《遐庵彙稿》上編，頁96。

12 “Meillet à Pelliot, le 19 mars 1920,” *Archives de l'HEC*。韓與伯希和的矛盾，據1920年伯氏3月23日寫給班樂衛的信中所言，係因韓認為他反對民國、擁護清帝復辟。但筆者以為，韓氏所謂他的加入「會引起某些中國人政治上的反對」很可能是另有所指，那就是伯氏在中國人中的文化「劫掠」者的形象。自1908、1909年間伯氏將數千卷敦煌文獻攜出中國國境的消息公之於眾之後，中國人無不痛心疾首，將他與另一位「偷盜」者斯坦因一道視為中國文化的劫掠者（雖然伯氏與斯氏對中國文物的處理及對中國人的態度完全有別），即使與伯氏交往密切的中國學者佩服伯氏的學問，但在有關論著中也仍然公開將伯氏的行為看作是劫掠者的行為，伯氏也因此不受中國人的歡迎，韓氏當年反對伯氏參與巴黎中國學院也當與此有關，擔心伯氏的形象損害他們所從事的中法文化交流事業，招致中方人士的反對；甚至有可能韓本人就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對伯氏的「盜寶」一事耿耿於懷。

13 “Lettre de Hain Jou-Kia à Pelliot, le 15 janvier 1920,” *Archives de l'HEC*.

和相關講座的開幕典禮，也拒絕加入巴黎中國學院顧問委員會（Comité consultatif）。¹⁴總之，伯氏不願意以一位局外人的身分參與巴黎中國學院的籌辦活動，他希望巴黎中國學院能在漢學家的直接領導和參與下活動，漢學家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

伯希和爭取漢學家在巴黎中國學院更大發言權的努力，在法國外交部的支持下，終於在 1926 年獲得轉機。蓋巴黎中國學院自 1920 年 3 月正式成立之後，由於中國國內政局動盪，北洋政府承諾的津貼從無到位，實際僅靠法國政府的補助勉強維持。1925 年中法兩國就法國退還庚款餘額問題達成協定，許多中法文化機構均因此獲得資助，巴黎中國學院也獲得每年 10,000 美金的津貼。在決定向中國學院提供此筆津貼的同時，法國外交部也增強了對該機構的話語權，支持法國漢學家參與巴黎中國學院的事務。1926 年 4 月 2 日，法國外交部在通知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的公函中，明確指示這筆款項的用途問題須徵求葛蘭言、馬伯樂（Henri Maspero）、伯希和、微席葉（Arnold Vissière）等法國漢學家的意見，並將此作為撥款的一個前提條件，指出「一旦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擬訂這筆資助的分配方案，請提交給我以便考核。一旦本部同意中國學院的計畫，這筆 10,000 萬美金的款項就可以交付該機構使用。」¹⁵根據外交部的要求，在 5 月 7 日由班樂衛主持召開的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會議上，與會者除討論經費使用、教學計畫等院務工作之外，還專門就伯希和參加中國學院教學工作問題進行討論。¹⁶

然而，由於此次的董事會議並沒有解決伯氏在中國學院的地位問題，伯氏仍然無意參與巴黎中國學院

的工作。7 月初，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根據韓汝甲的提議，決定撥款 24,000 法郎，在法蘭西學院院長克魯瓦澤（Maurice Croiset）和伯希和的指導下，拍攝由伯氏帶回尚未編目的敦煌手稿。在接到這個通知後，伯氏斷然拒絕，並就此問題致函班樂衛，明確表示「只要我們漢學家對於我們在巴黎中國學院應該扮演的角色和我們可以施加的影響不是十分清楚的話」，他本人不會參加敦煌手稿的拍攝工作，並指出鑒於法國漢學在國外的聲譽，如果獲知巴黎設立的中國學院董事會不包括微席葉、馬伯樂、葛蘭言和他本人，那麼「我們在國外的同胞會感到十分驚訝」；直言他本人 7 年來與中國學院的糾葛和對立，班氏應負其責。¹⁷同時，伯氏也沒有配合巴黎中國學院，就經費的使用問題提出個人意見，以便巴黎中國學院早日獲得撥款。法國外交部為此專門給伯希和發了一封私人短信，要求他將巴黎中國學院的報告和有關庚款預算方案寄給外交部，「以便在假期以前批准，這樣這筆款項就可以供中國學院支配。」¹⁸

由於法國外交部在巴黎中國學院問題上十分看重伯氏的意見，時任法國陸軍部長的班樂衛為了早日獲得經費，也只好紆尊降貴，主動約見伯氏。¹⁹經過幾次會談，最終解決了伯氏在巴黎中國學院的地位問題，會議決定任命伯氏和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校長布窪葉（Boyer）為中國學院董事會成員，以代替辭職的巴黎大學文學院院長布露歐（Brunot）和法蘭西學院教授梅耶（Meillet）；同時，會議根據會長的建議和此前組成的董事會的意見，任命葛蘭言擔任巴黎中國學院行政院長（Administrateur），由伯氏和布窪葉、法蘭西學院教授費諾（Finot）、葛蘭言、勒盧瓦（Laloy）、馬伯樂及微席葉等 7 人組成研究指導

14 “Painlevé à Pelliot (non daté),” *Archives de l’IHEC*.

15 “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M. le Président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aris, le 2 avril 1926.”

16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7 mai 1926,” *Archives de l’IHEC*. 按：出席此次會議的人員有：阿貝爾（M. Pierre Appell，班樂衛陸軍部辦公室主任，Le Directeur du Cabinet Civil du Ministre de la Guerre）、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校長布窪葉（P. Boyer, Administrateur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寶海（E. Borel，曾任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院長，後任法蘭西研究院院長）、Germain Martin（巴黎大學法學、經濟學教授，1920 年曾隨班樂衛訪華）、葛蘭言、巴黎中國學院行政秘書基耶（Guillet）、漢學家兼東方語言學校教授微席葉。

17 “Brouillon de lettre de Pelliot à Painlevé, le 16 juillet 1926,” *Archives de l’IHEC*.

18 “Mot personel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8 juillet 1926,” *Archives de l’IHEC*.

19 “Mot du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à Pelliot ; le 3 aout 1926,” *Archives de l’IHEC*.

委員會（un Comité de Direction d'Etudes），²⁰協助行政院長管理學院工作。²¹伯氏由局外人到加入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這對巴黎中國學院後來發展成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具有重大意義。

二、巴黎中國學院之柱石

從 1927 年伯希和加入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到 1940 年 6 月德軍佔領巴黎的 14 年，是巴黎中國學院歷史上的一段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裡，伯氏積極參與中國學院的各項活動，為把巴黎中國學院建設成為國際著名的漢學研究中心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從事漢學教學、培養漢學研究人才，是巴黎中國學院的首要目標。在 1926 年獲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Commission Mixte des Oeuvres Franco-Chinoises）的庚款資助後，巴黎中國學院的各項事業才得以真正展開。1927 年巴黎中國學院行政院長葛蘭言就特別強調漢學教學在學院工作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學院的首要任務是要讓人們瞭解中國和中國人。這一任務已由幾代漢學家，其中包括相當一部分傑出的法國學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中國就是一個世界，它擁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歷史。為了認識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利用中國歷史所包含的豐富的人類經驗，建設漢學家隊伍是必要的。所以，中國學院的最直接目標就是要招收並培養漢學研究人員。」²²

中國學院正式開課後，共開設了 7 門課程，它們分別為：中國文明，中國文獻學、文學與藝術，中國美學，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中國現代政治與外交史，中國法律

和中國科學。其中，伯氏和葛蘭言均任教授，分別講授中國文獻學、文學與藝術和中國文明課程；另外四門課程依次由勒盧瓦、墨司它（Edouard Mestre）、²³杜巴碧埃（Dubarbier）、愛司加拉（Escarra）等四位講師擔任；中國科學課程（Sciences Chinoises）由於沒有合適的學者，教授人選一直不定，先後曾聘請一些中國學者作專題講座，如邀盛成講授中國蠶學，中央大學教授何尚平講授中國農學及特產，褚民誼講授中國醫學等，一度甚至將此門課程改為中國文學課，先後由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和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吳康擔任。²⁴

就伯氏所任課程來說，其教學工作量僅次於中國學院行政院長葛蘭言。伯氏講授的內容極為豐富，講授的題目有「中國古代藝術研究導論、一個漢學家所使用的資源與目錄、中國歷史學家、中國藝術史、中國藝術的宗旨、目錄學入門、中國藝術與外來影響、1930 年的漢學研究、中國藝術中的外來影響、中國典籍、1931 年的漢學研究、中國美術、1932 年的漢學、1933 年的漢學、唐以來的中國美術、殷周時期的中國藝術、中文書目提要、周代的中國藝術、漢代藝術、宋元時期中文書目提要、從敦煌石窟看唐代中國佛教藝術、元代中文書目提要、元明時期書目資料、二流藝術」。²⁵

值得指出的是，伯氏講課的內容和程度也緊扣巴黎中國學院培養漢學專門研究人才的宗旨，既不同於一般語言學校的教學，也有別於法蘭西學院等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的漢學教學。1927 年伯氏在董事會上介紹自己開設的「中國文獻、文學與藝術」課程的內容和宗旨時，就明確表示該課旨在彌補目前漢學教學中存在的不足，指出其開設的課程「既不能歸入東方語言學校的教學框

20 後改為 Comité Directeur des Etudes.

21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Séance du 5 février 1927,” *Archives de l'IEHC*. 葛蘭言雖被任命為中國學院行政院長，但他並非董事會成員，作為學院行政院長，他有權列席董事會並發言。

22 Marcel Grane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 *Annales Franco-Chinoises*, N° 2, 2ème Trimestre 1927.

23 墨司它同時兼任巴黎中國學院財務秘書（Secrétaire-Trésorier）。

24 代理巴黎大學中國學院中國政府代表劉厚，〈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概況〉，《中法大學月刊》4：2（1933.12.1）；Programmes des cours、conférences pour les années scolaires 1931-1932，1934-1935，1936-1937，1937-1938,” *Archives de l'IEHC*.

25 伯氏講課最初係在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宗教系和歷史與文獻系分別進行，自 1930-1931 學年起，隨著巴黎中國學院在巴黎大學安置後，就一直改在索邦（La Sorbonne, Galerie Richelieu）上課。

架，那裡只開設一些初級課程，同樣也不能納入法蘭西學院和高等實驗研究院的框架，那裡只闡述非常專門的問題。而中國學院的課程則是為了引導學生實現東方語言學校的課程與只講述專門研究成果的課程之間的過渡與銜接。」²⁶

在教學方法上，伯氏以其早年中亞等地的豐富實地考察經驗和其對法國所藏中國文獻和藝術品的熟稔，將抽象的教學與感性的實物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其在講課過程中，還經常組織學生走訪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塞爾努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等收藏東方藝術品較多的法國博物館，親身接觸課堂中所講授的文獻和藝術品。同時，由於伯氏知識淵博，口才出眾，他的講課深受學生的歡迎。1946年繼任巴黎中國學院行政院長的羅都爾（Des Rotours）在舉行追悼二戰期間相繼去世的四位中國學院教師大會上就指出，伯氏所授「中國文獻學、文學和藝術」課程在當時曾受到聽講者的極大歡迎。²⁷當年聽過伯氏授課的哈佛大學前遠東語文系主任葉理綏（S. Elisséeff，同時也為伯氏的學生）在紀念伯氏的文章〈保羅·伯希和（1878-1945）〉中亦稱伯希和在索邦的講授「既明透，又淵博」。²⁸

另外，作為一位知名漢學家，伯氏從一開始就站在國際漢學的高度，不將巴黎中國學院局限於僅僅培養法國漢學人才，而有意於將中國學院作為一個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從這一高度出發，根據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其他美國大學所考察的漢學教學情況，在1927年巴黎中國學院開課後不久舉行的一次中國學院研究指導委員會（Comité Directeur des Etudes）會議上，伯氏即建議學院

不但要招收法國和歐美等國的學生，而且要吸引留法的中國學生。針對漢學家微席葉提出中國學生留法的唯一目的是學習歐洲科學，對學院開設的漢學課程不感興趣，他們認為作為中國人，他們聽與中國有關的課程，學不到對他們國家有用的知識，伯氏不以為然，予以反駁。他指出關鍵在於只要這些與中國有關的課程是以科學方式講授的，它們對中國學生來說，就仍然是有益的。²⁹從後來的情況來看，巴黎中國學院顯然接受了伯氏的這一意見。在中國學院註冊聽課的中國學生從開課初期的2、3人，到1929-1930學年即升至6人，1931-1932學年升至19人，³⁰在巴黎中國學院招收的學生中，人數最多的是中國人，其次為法國人，此外有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義大利人、葡萄牙人、瑞士人、俄羅斯人、波蘭人、匈牙利人，還有東方人如越南人、日本人。除了正式學生外，中國學院還有外來聽眾，同樣來自不同國家。這樣，巴黎中國學院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國際漢學研究中心。

巴黎中國學院及後來的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得以成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還在於其收藏了豐富的中國典籍。巴黎中國學院成立之初，即將設立中國圖書館作為該院的一個重要目標，在獲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固定資助後，圖書館建設受到高度重視，在每年的預算中，購買圖書的經費，約佔總經費的八分之一，並且常常因特殊需要而追加圖書經費。在中國學院圖書館建設方面，伯氏作為一名漢學巨擘，憑藉其豐富的目錄學、文獻學知識和早年在中國採購圖書的經驗（1900年左右為法蘭西遠東學院在北京採購圖書），以及與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聯繫，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

26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9 juillet 1927," *Archives de l'ITHEC*. 當時巴黎高等教學與研究機構開設的有關中國的課程如下：現代東方語言學校（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有微席葉的中文課、葛蘭言的遠東國家的地理、歷史與制度；法蘭西學院有馬伯樂的中國語言文學、伯希和的中亞語言、歷史與考古學；高等實驗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有葛蘭言的遠東宗教。

27 "Discours de M. Des Rotours à la Cérémonie Commémorative du 14 Décembre 1946," *Archives de l'ITHEC*.

28 葉理綏（S. Elisséeff）〈保羅·伯希和（1878-1945）〉，見李璜編，《法國漢學論集》（香港：香港珠海書院出版委員會，1975），頁54。

29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roce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2 juillet 1927 du Comité Directeur des Etudes," *Archives de l'ITHEC*.

30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Séance du 25 mars 1931 et Séance du 16 juin 1933."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220 et No. 396.

用。1927-1940 年間巴黎中國學院的圖書，許多即是在他的指導下或由他本人親自購買的。

1927 年在獲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資助後，巴黎中國學院即撥款委託東方語言學校檔案保管員和圖書館員李鄴 (Rénié)³¹ 首次在中國大規模採購圖書。為了確保圖書的學術價值，由伯氏和微席葉等漢學家組成圖書館小組委員會 (Sous-commission de la bibliothèque)，專門負責為李鄴擬定採購指示。³² 從後來李鄴實際採購清單來看，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和孤本，成為巴黎中國學院圖書館的重要典藏。應該說，這與伯氏的指點是分不開的。

巴黎中國學院常年的圖書採購，伯氏也是躬與其事。如在 1928-1929 學年，巴黎中國學院以非常優惠的價格購置了一批重要的參考書和大型叢書，便是根據伯氏的建議。³³ 1931-1932 學年中國學院複製 (拍攝) 列寧格勒所藏蒙古秘史手稿，一套為中國學院所有，另一套則由伯氏與中國交換其他書籍，也是出於伯氏的倡議。³⁴ 此外，在中國學院收購私人藏書時，也由伯氏負責挑選。³⁵

除為中國學院採購圖書提供直接指導外，伯氏還親赴中國採購圖書。在 1933 年旅居北京期間，伯氏除研究、考察中國古籍和美術及參觀北京一些著名學術機構外，將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購書上。根據法蘭西學院漢

學研究所所藏當年伯氏的購書發票，從 1933 年 1 至 4 月，伯氏前後光臨琉璃廠與隆福寺街的 38 家大小書坊，為中國學院搜購圖書。最後採購的圖書共計 1,926 種，至少達 26,294 冊，另有拓片及地圖 438 張又 2 袋圖和一套圖，金額約 23,162 中國國幣。³⁶ 從書的版本來看，不僅有普通的印刷本，還有刻本、抄本、稿本、足本等所謂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從書的內容與性質來看，叢書與方志所佔的分量最重，尤其是叢書，在伯希和所購的近 2,000 種書中，書名帶有叢書字樣的就有 105 種。³⁷

伯氏此次赴華，除為巴黎中國學院搜購圖書外，還透過他個人的關係，促成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北平圖書館分別向巴黎中國學院贈送書籍。1933 年 2 月 4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致函伯氏，同意將該所出版物 (至 1933 年 1 月為止，除有一種尚在印刷中之外) 贈送給巴黎中國學院。³⁸ 同日，即將該所出版物裝置一箱，並附上書目清單，派專人送交伯氏，共 27 種 61 冊。³⁹ 3 月 27 日，國立北平圖書館也因伯氏的要求，向巴黎中國學院贈送了一套該館的出版物，同時也向伯氏個人贈送了一部分圖書。⁴⁰ 其中，贈送給巴黎中國學院的圖書共計 41 種 160 冊，多為圖書目錄學方面的著作。⁴¹ 另外，北平圖書館還從這些出版物中，挑選一部分贈送伯氏個人，共計 17 種 35 本。⁴² 繼 1933 年的大規模採購之後，伯氏於 1935 年訪

31 李鄴小姐後成為默弗萊夫人 (Meuvret)，直到 1970 年為止，她一直擔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館長。該資訊由法蘭西學院教授、漢學研究所所長魏丕信 (Pierre Etienne-Will) 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的來函中提供。

32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10 juillet 1930,”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220.

33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10 juillet 1930,”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220.

34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16 juin 1933,”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396.

35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18 juin 1938,” *Archives de l’IHEC*.

36 按：由於有些書只有部數或者套數、函數、匣數等，無冊數或者本數，這裡只按 1 冊計算，因此，總冊數只會超過本文所統計之數。

37 按：以上資料均系根據伯氏購書發票統計求得，相關發票，此處不便一一羅列。

38 “Fu Ssu-nian to Pelliot, February 4, 1933,” *Archives de l’IHEC*.

39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部吳巍至伯希和，1933 年 2 月 4 日，*Archives de l’IHEC*.

40 Yuan Tong-Li, “the Acting Director of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to Prof. Paul Pelliot, Peiping, March 27, 1933,” *Archives de l’IHEC*.

41 國立北平圖書館，《贈巴黎中國學院之書》，*Archives de l’IHEC*.

42 國立北平圖書館，《贈伯希和教授之書》，*Archives de l’IHEC*.

華時，也曾為巴黎中國學院選購新書。⁴³

伯氏為巴黎中國學院圖書館建設所做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轉讓個人私藏。1932年伯氏將他寄存在吉美博物館的個人收藏以僅高於原價的三分之一的價格，轉讓與巴黎中國學院。對於伯氏的這一舉動，董事會當即對伯氏的大公無私和他對中國學院的忠誠表示衷心的感謝。⁴⁴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這些有形的貢獻之外，鑒於伯氏當時在國際漢學界的聲望，他對巴黎中國學院精神上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誠如1933年代理巴黎中國學院中國政府代表劉厚在寫給中國政府的報告中闡述葛蘭言和伯氏對中國學院發展的影響時所說：「該院成立迄今，雖已十三載，但自民國十五年後，始得固定其預算，完成其組織，自是逐漸發展，生徒亦年有增加，刊物漸次發行，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此乃葛蘭言君熱心辦理有以致之。又伯希和君為該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幫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後，而為法國漢學家之泰斗，今教授其間，殊增該院之榮威，此巴大中國學院所以極為歐美漢學家所矚目也。」⁴⁵

三、在戰亂中出任中國學院行政院長

1940年是法國現代歷史上不幸的一年，也是巴黎

中國學院人事發生重大變動的一年。是年6月法國首都巴黎被德軍佔領，成為淪陷區，不到半年時間，巴黎中國學院的第一任行政院長葛蘭言也於11月25日溘然去世。12月18日，董事會應會長寶海（Emile Borel）⁴⁶的召集，在索邦召開會議，決定由伯氏接替葛蘭言，繼任中國學院行政院長。⁴⁷

在出任中國學院行政院長後，伯氏於危難之際盡力維持學院的運轉。首先，在教學上，他繼續安排相關漢學課程，並根據慣例，承擔最大的教學任務。1941-1942學年，他開設的課程為：1. 有關藝術史的中文文獻解讀；2. 韓非子文選；3. 元明書目提要。1942-1943學年，將其中的韓非子文選改為墨子文獻，其餘不變。1943-1944學年的課程為：1. 中國藝術史文獻解讀；2. 墨子解讀；3. 中國古籍書目提要。1944-1945學年的課程為：1.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2. 中國古籍書目提要（續）；3. 關於中國藝術的文獻解讀。另外，伯氏還聘請漢學大師馬伯樂接替葛蘭言，講授「中國文明」。在1941-1945年的四年裡，馬氏所開的課程有：史記與前漢書的儒林傳、中國行政史、歷史文獻釋讀、六朝典章制度。同時，繼續保留勒盧瓦、墨司它、杜巴碧埃和愛司加拉等四位講師的課程。⁴⁸

除繼續維持與安排日常的漢學課程外，伯氏在負責巴黎中國學院期間，為了擴大學生的知識面，與其前

43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Séance du 3 juin 1935.”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396

44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Séance du 18 mars 1932.”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396.

45 同註24。

46 按：寶海係於班樂衛去世後，由巴黎中國學院董事會於1934年2月14日召開臨時會議，議決由他繼任董事會會長，其時寶海為法蘭西研究院院長（Président de l’Institut de France）。參見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14 février 1934,”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396.

47 按：此次會議除任命伯為行政院長外，還對巴黎中國學院的其他人事作了重要的調整，任命法國現代東方語言學校名譽校長布羅葉（Paul Boyer）和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擔任董事會副會長，另應伯氏的提議，馬伯樂成為董事會當選委員。參見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Séance du 14 février 1934.”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onds du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No. 396.

48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Séance du 30 juin 1941, Séance du 20 mai 1942, Séance du 21 juin 1943, Séance du 16 mai 1945, Séance du 30 juin 1946,” *Archives de l’IHEC*.

任一一樣，繼續組織講座，仍安排二個系列：一由杜伯秋（Dubosq）主講中國時局問題，二是由巴斯德學院主講關於中國和遠東的醫學衛生的講座，每年各3次。從後來實際執行情況來看，杜伯秋因人在中國未能開設擬議中的講座，但巴斯德學院的每年三次講座都能按計畫執行。為保證講座順利進行，伯氏每次事先致函巴斯德學院盧波（E. Roubaud）教授，商定和落實講座人選、內容、時間、地點。

在伯氏主持下的巴黎中國學院開設的課程和舉辦的講座，既體現了法國漢學偏重文明史研究的風格，擴大了漢學研究的範圍和內容，但同時也反映了法國漢學對現實中國的關注，表明法國的漢學研究與後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並非彼此對立的。

在他執掌巴黎中國學院期間，伯氏還盡力保護同事、提携後輩、關心學生，體現了一位長者的風範。巴黎被佔領後，一些仍然留在學院讀書的中國學生生活上遇到極大的困難，伯氏對此深為同情，為不增加中國學生的壓力，有意降低學習要求。1945年1月25日他在美國中華藝術協會歡迎會的演講中這樣深情地說道：「我不能要求學生們一如平日那樣認真研究。我的中國學生們因生活艱苦，身體衰弱，其中若干都患有肺病。我又如何能希望他們再去十分用功研究。」⁴⁹對於他的法國同事和學生，伯氏更是倍加保護，並予提携。二戰期間，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對於教職員工的思想行為動態檢查甚嚴。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煩，伯氏在1942年6月25日回覆巴黎大學區區長（le Recteur de l'Académie de Paris）介紹巴黎中國學院教學人員戰時活動情況時，除介紹他本人因學術需要與國外有所交往外，強調其他

人員與國外均無任何聯繫；在介紹中國學院所設課程時，則有意略去墨司它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課程和杜巴碧埃的「現代中國政治與外交史」課程。⁵⁰伯氏還曾親筆簽名發布通告，警告學生在學院裡不得「討論來自外界的有關漢學以外的問題」。⁵¹1944年3月間，為保護時年33歲的巴黎中國學院圖書館員助理康德謨（Kaltenmark）免服兵役，伯氏先於6日覆函巴黎大學區區長，表示中國學院沒有35歲以下人員，加以隱瞞。⁵²在巴黎大學區區長再次來函催詢後，伯氏則於3月10日覆函，以康德謨承擔的工作為本院不可或缺，要求將康氏排除在服兵役之外，指出：「中國學院唯一一位年齡介於21-35歲的人是康德謨，今年33歲，他負責本學院的西文圖書，無論從中國學院的運行還是從他在學術領域所從事的原創性工作來講，他都是不可缺少的人才。」⁵³1945年9月間，在得知巴黎中國學院學生、法國年青漢學家李嘉樂（Alexis Rygaloff）在中國遇到困難、要求回國的消息後，伯氏即抱病寫信給法國外交部文化關係總局的讓·馬克思（Jean Marx），請求他提供幫助，建議任命李嘉樂為河內法蘭西遠東學院的臨時成員，並請求設法幫助尋找法國年青漢學家石泰安（Rolf Stein）的下落，推薦他繼任戴密微（Demiéville）調任後留出的空位。⁵⁴正是在伯希和的提携與保護下，康德謨、石泰安、李嘉樂等這些年青的法國漢學家後來成為戰後法國漢學界的中堅力量，使法國漢學隊伍在經二戰期間葛、勒、馬、伯等人相繼謝世而遭受重創之後仍得以傳承。

在法國維希政府的統治下，雖然巴黎中國學院的教學和講座等工作沒有遭到德軍的嚴重干涉，並繼續獲

49 伯希和，〈大戰中的法國東方學學人〉，見李璜編，《法國漢學論集》，頁60-61。

50 "Pelliot, membre de l'Institu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à Monsieur le Recteur de l'Académie de Paris, 25 juin 1942," *Archives de l'IHEC*.

51 "Pelliot : Notification de l'Administrateur (non datée)," *Archives de l' IHEC*. 在該通告上簽名的學生有李嘉樂、葉理綏及8位中國學生。

52 "Pelliot, membre de l'Institu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à Monsieur le Recteur de l'Académie de Paris, Paris, le 6 mars 1944." 按：康德謨實際上生於1910年11月10日，*Archives de l'IHEC*.

53 "Pelliot, membre de l'Institu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à Monsieur le Recteur de l'Académie de Paris, Paris, le 10 mars 1944," *Archives de l'IHEC*.

54 "Pellio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à Jean Marx,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irection général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le septembre 1945," *Archives de l'IHEC*.

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年款支持，但受戰時狀況的影響，年款拖欠常有發生，並且，受法國通貨膨脹的影響，也使巴黎中國學院的經費遇到極大的困難。為籌措經費，維持學院的正常運轉，伯氏亦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爭取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1942年2月16日，伯氏就1940年度20萬法郎庚款年款未能在是年底按時撥付而一直拖至1941年的夏天支付一事，專門寫信給法國外長，希望外交部在巴黎中國學院已與中國中斷所有聯繫、已無可能從中國方面獲得資助的情況下，給予巴黎中國學院更大的關注，確保經費的供給，建議「請貴部有關部門研究一下海外事業處可以通過什麼方式取代1942年度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撥給中國學院的款項。」⁵⁵ 1945年5月4日，在收到中國政府1萬美金的特殊補助後，伯氏即代表董事會致函中國駐法大使表示感謝，稱將在合適的時候會由董事會對之進行正式的感謝。⁵⁶ 同年9月，伯氏又在病危之中寫信給法國外交部文化關係總局局長洛吉耶（M. Laugier），鑒於法郎貶值嚴重，

請求增加撥款，指出：「局長先生：由於身體原因，使我動彈不得，且被迫住院，這使我不能前去與您商談巴黎中國學院的問題，它正面臨困難，急待找到解決辦法。迄今為止，巴黎中國學院的預算主要是根據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支付的年款來制訂的……物價的上漲迫使我們只得將工資的提高限制在次要人員。在董事會上，寶海會長在副會長蕭瑜的支持下，促使董事會通過關於將教學報酬在1927年以來所制定的標準基礎上增加一倍的提案。由此，7月9日臨時登記的數目為224,000法郎，而實際的數目應為426,000法郎。」最後，他在信末這樣動情地寫道：「在這些年裡，法國漢學遭受沉重的打擊，但這並不能成為讓其喪失一直佔有的地位的一個理由。一旦我身體恢復，我一定要致力於捍衛法國漢學，培養漢學精英。但是，漢學家不能臨時充當，為了取得成功，我非常需要您的支持。」⁵⁷ 伯氏的這封信也就成了他對巴黎中國學院的臨終關懷，寄託了這位漢學大師臨終之際對法國漢學保持國際領先地位的無限希望。

55 “Peliot au Ministre Secrétaire d’Etat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Etranger), le 16 février 1942,” *Archives de l’IHEC*.

56 “Peliot, Membre de l’Institu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à l’Ambassadeur de Chine à Paris, Paris, le 4 mai 1945,” *Archives de l’IHEC*.

57 “Peliot, Membre de l’Institut, Administrateur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à Monsieur Laugier,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Septembre 1945,” *Archives de l’IHEC*.